

## 主报告

# 1996—2010 年中国社会 会全面发展战略研究

## 一、新的全面发展观的确立

### （一）发展观的转变

1978 年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满足人民生活基本需要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战略。党的十二大确定，从 1981 年到本世纪末的 20 年，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总产值翻两番。但当时的国家计划仍然主要是经济计划，仍未改变偏重于经济的发展。1982 年 12 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才正式把第六个五年计划易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增加了“社会发展”的一些内容和指标。第七个和第八个五年计划又进一步有所前进。

实际上，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追求整体的社会发展，这

是世界性的发展观的转变，也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走过的历程。二次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从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尽快提高非常低下的生产力，缓解和消除贫困，增强国家的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确立了以经济增长，更确切地说是以提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收入）为目标的发展战略。因为一般来说，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提高会相应地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况且这也是西方国家走过的成功之路。联合国关于第一个发展 10 年（1960—1970）的报告，1969 年应世界银行要求提出的皮尔逊发展报告，以及作为联合国第二个发展 10 年规划底本的 1970 年丁伯根发展报告，都是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实行“先增长后分配的战略”。但是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社会发展的传统发展观在几十年的实践中遇到诸多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只要是“经济的”就是“合理的”观念指导下，资源消费和短缺加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贫富差距拉大，产业结构畸形，债务有增无减，造成“有增长而无发展”，平民教育、劳动保护、社会福利、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社会公正等与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的进步因素，都被当作经济增长的代价牺牲掉了。这种实践结果，使人们的发展观产生变化，各种“替代发展战略”和“新发展观”随之出现。较有代表性的，就是 1976 年国际劳工组织在世界就业大会上提出的“基本需求战略”、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的“持续发展战略”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4 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新

的人类安全观”。各种新发展观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从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转而追求社会的全面发展，从单纯追求当代人的发展转向同时也追求未来人类的发展，把消除贫困、公平分配、大众参与、资源节约、生态保护等多种社会价值作为发展目标，其中人的基本需求和全面发展是中心目标。

## （二）新的发展观的基本内容

从发展中国家走过的道路和我国四十多年的发展历史，特别是从近十几年的实践来看，我们的新发展观应当有三个前提或者说三个基本判断，即：关于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判断、关于综合国力的基本判断和关于社会总资源合理配置的基本判断。

关于什么是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基于不同的价值观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达到世界性共识的，那就是不能仅仅以经济增长的指标来衡量，特别是不能仅仅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数量增长来衡量。社会发展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它应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社会结构、人民生活、科技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会秩序等各个方面，因而应当建立一套较完备的社会发展描述体系和指标体系。同时，对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评价不仅要考虑到当代的生存和发展，而且要顾及到未来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利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其发表的《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中，用人均预期寿命、识字率和按购买力平均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三项指标来推算人文发展指数（HDI）对世界上173个国家

家和地区进行比较，结果表明，1992年中国的人文发展指数排在第94位，比人均GNP排序高49位，属于“中等人文发展水平”。

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上具有的真正实力以及确立其在国际局势中的位置，应当首先考虑综合国力。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可以动员起来投入社会发展、施加国际影响和进行国际抗衡的综合力量，它包括资源力量、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军事力量、科技力量和文化力量。换句话说，地理特征、人口规模、资源多寡、经济技术水平、财力、军备状况、人才资源、民族特性、社会整合程度、政治和生活的稳定性、国民士气、政策和战略选择等都是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在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不同国家的综合国力是会迥然而异的。根据有关部门进行的综合国力动态分析，中国的综合国力1949年列居世界第13位，1988年上升到第6位，预计到2010年，综合国力将达到世界第5位。

社会总资源的合理配置应当作为衡量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准。对资源配置的考察不应只局限于经济领域，而应扩展到整个社会领域，因为社会的人口、生活、科技、教育、社会保障等任何一个方面都有可能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瓶颈。在社会领域，资源合理配置不能完全依靠市场导向，而应有行政干预，但这种干预应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前提，而不能作为超经济的主宰力量与市场力量相抗衡。我们不追求设立某种理想的最佳方案，但是，我们可以在经验统计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起自然资源、资金、物力、人

力、智力和信息在总体上趋向合理的分配模式和比例关系。

## 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的回顾与总结

（一）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两个转变同时并进”，是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

从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方面看，中国目前处在两个转变之中。一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化社会转变，这是社会结构的转型；二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是经济体制转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取得的一切成就和经验，面临的一切困难和挑战，无不与这两个转变相联系。

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同时并进，形成相互推动的趋势，这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是很少见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一般来说，社会结构转型本身就包含体制改革的内容，因为它通常是从结构变动弹性较大的生产结构层次的变化向体制结构变革的过渡过程，但中国的体制改革是结构转型的原动力之一，它通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个程序进行，使结构转型进入加速期，所以体制变革和政策导向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并非是一个过程。由于发展起点

低、基础薄弱、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紧缺、发展不平衡等各种条件的限制，结构转型不可能在一个短时期内完成，而是一项贯穿于整个现代化过程的长期任务。即便是中国达到小康生活水平、达到了中下等收入国家的发展程度，中国在总体上也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依然处于结构转型时期的国家。

相对于结构转型来说，中国的体制转轨并非是从一种传统体制向另一种现代体制的过渡，而是从一种完备的但缺乏效率的现代体制向另一种更有效率的现代体制的转变。这种转变更重要的是一个效率问题，而不是一个“发展程度”或“发展阶段”的问题。当然，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和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这一现实，必然对体制转轨的程序、形式和时段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改革中速度观点和稳定观点的争论，单项突破观点和整体配套观点的争论以及各种关于改革力度和改革程序的争论，从深层次上说都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特征对体制改革方式的影响，而不仅仅是经济理论或政治观点上的差异。

不过，尽管体制改革在中国是一个渐进的变革过程，但体制转轨并不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全部内容，与整体的现代化过程相比较，体制转轨应当在一个相对来说不是太长的时距中完成，这是降低改革成本所必须的。

两个转变的同时并进，一方面形成相互推动的趋势，另一方面也使结构冲突和体制摩擦交织在一起，增加了改革和发展的难度。中国在进行各项政策选择时，都不能忽略“两

个转变同时并进”这一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特征。

## （二）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基础

1979—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 8.9%，增长速度处于世界前列。其中第一产业平均每年增长 5.2%，第二产业 10.7%，第三产业 9.9%，同期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 9.9%。与此同时，全国人口平均每年增长 1.4%，社会劳动者人数平均每年增长 2.8%。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已从 1978 年的 375 元提高到 1992 年的 2 048 元，增长了 4.5 倍。1993 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 30 000 亿元大关，达到了 31 380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13.4%，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2 648 元。1994 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43 800 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3 675 元。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重申的 1980—2000 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经济增长目标，从目前的发展速度来看，可望在 1995 年提前五年实现。

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前提。只有经济在提高效益的前提下长期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才能具有持续地较强地扩大再生产能力，才能有更多的剩余产品用于分配，人民生活才能得到稳步提高，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才能逐步缩小。“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道理也正在于此。

## （三）转换运行机制是发展的动力

改革开放的实质性目标 就是转换经济社会运行机制 提

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和效益，并调动起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几年来的改革开放，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逐步成为相对的商品生产者，有了生产、经营、交换的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崛起，改变了农村中的单一经济成分，使市场经济因素首先在农村得到迅速成长。取消了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开放了农村集市贸易，农业经济和农民生活消费基本打破自给自足，农副产品的商品率和农民生活消费支出的商品率都大大提高。城市的经济体制转轨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二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这两个方面又是密切相连的。城市改革从企业放权让利开始，实行利改税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后，企业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开始触及到深层的企业产权问题；财政、金融、外贸外汇体制的改革将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后攻坚战铺平道路；各种经济成分迅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市场价格调节机制已基本建立，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家指令性计划的比重，已由 1979 年的 70% 下降到目前的 5% 左右，国家管理的零售商品物价，已由 1979 年的占销售总额比重的 95% 以上，下降到 5.9%，综合评价的市场对商品价格的调节范围已达 90% 左右，市场对服务价格的调节范围明显扩大，对生产要素价格逐步发挥调节作用；在完善消费资料市场的同时，也逐步建立起发育程度不同的资金市场、技术市场、劳

务市场、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和股票证券市场等等。总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得到显著提高。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对外开放也逐步从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开发区发展到沿海、沿边、沿江、沿城市的全方位开放格局。1978—1994年，中国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 957 亿美元，仅 1994 年就达 338 亿美元。1994 年与 1980 年相比，进出口总额由 381 亿美元增加到 2 367 亿美元，增长 5.2 倍，已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 45.9%，其中出口总额由 181 亿美元增加到 1 210 亿美元，进口总额由 200 亿美元增加到 1 157 亿美元。中国出口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在世界各国的排序中由 1978 年的第 32 位上升到 1994 年的第 11 位。进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由 1980 年的 49.7% 上升到目前的 80% 以上，初级产品的比重则由 1980 年的 50% 以上下降到目前的不足 20%。对外开放的更深刻意义，不仅仅在于引进资金和技术，而在于通过与国际市场接轨，转换经济运行机制，所以说，开放也是改革。

社会发展并不是一个可以人为控制的过程，推动社会结构变动的基础性力量，并非是理性的强有力政府或古典意义上的市场（完全的自由价格和自由竞争），而是蕴藏在亿万人心底的求生存、求发展的强烈欲求和广大人民群众改造社会的伟大实践。在各种社会资源中，人依然是最宝贵的资源，只要把亿万人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可以化为巨大的社会财富。中国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通过改革转换

经济社会运行机制，顺应了人民群众的要求，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调动起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等量投入的情况下获得更大的产出效益。

没有人民群众发展的积极性的持续推动，没有社会运行机制的转换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仅靠高投入维持的“速度效益”，是不可能持久的。

#### （四）结构转变是发展的实质性内容

结构转变并非是经济增长的自然结果，恰恰相反，发展的实质性内容是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

从十几年的改革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结构转变与改革的进程、经济的增长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首先是从结构变动弹性很大的农业和农村领域启动。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动，使改革很快取得了成效，并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改革十几年来，伴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1978 年的 375 元增加到 1994 年的 3 675 元（虽然按汇率法计算的人均 GNP 美元数变动不大）社会结构的一些重要方面如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1978—1994 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所占的比重从 28.4% 下降到 18.8% 工业和建筑业所占的比重，从 48.6% 下降到 48.5%，服务业的比重有了明显上升，从 23.0% 增加到 32.7%。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比重有漏算的

部分，根据世界银行《1994 年世界发展报告》的数据，以购买者价值计算，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服务业产值所占的比重 1992 年已达到 38%，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分别是 27% 和 34%。

就业结构是社会结构的另一个重要方面。1978—1994 年，在社会从业人员总数中，农业从业人员，所占的比重从 70.5% 下降到 54.3%。工业从业人员所占的比重从 17.4% 上升到 22.7%，服务业从业人员所占的比重从 12.1% 上升到 23.0%。城乡结构的转换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1978—1994 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 17.9% 上升近 30%，如果考虑到统计口径偏小的因素，估计目前已达到 35% 左右。但必须指出，我国的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都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

目前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发展战略调整的问题，即从追求单纯的产值增长转向追求全面的社会结构转变，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转向同时追求经济增长的效益和增长的结果。从一些新兴工业国的经验来看，结构转变和利用先进科学技术是加速发展的两个最主要因素。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劳动力的转移和资源再配置是更重要的增长因素，因而结构转变形成的加速力量会更加明显，也更为重要。

#### （五）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稳定发展的保障

广大人民群众从改革和发展中获得了“实惠”这是在结

构转型和体制转轨中社会得以保持稳定的重要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得到较快增长。1978—1994年的16年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1223元，年均实际增长8.3%，而1958—1978年的21年间仅增加61元；同期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从316元增加到3179元，年均实际增长6.5%；职工平均工资也从615元增加到4535元，实际平均工资年均增长4.0%而改革前的26年平均每年仅增长0.5%。

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1978—1994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从175元增加到1737元，平均每年实际增长7.0%以上，农民平均消费水平从132元增加到1087元，平均每年增长7%左右，非农业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从383元增加到3956元，平均每年增长6.9%。农村居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比重）从1978年的0.68%下降到1994年的0.59%，同期货币性支出所占的比重从39.7%上升到64%左右。

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得到明显改善。1978—1994年，全国平均每人储蓄存款余额从21.9元增加到1795.5元；平均每人居住面积，城镇从3.6平方米提高到7.8平方米，农村从8.1平方米提高到20.3平方米；每万人口拥有医生从10.7人增加到16人；婴儿死亡率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人均预期寿命增加到70岁左右，成人识字率提高到80%以上，均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水平；平均每万人口的大学生人数也由1978年

的 8.9 人增加到 1994 年的 23.4 人；城镇平均每一个就业者负担人数（包括就业者本人）从 2.06 人下降到 1.74 人，农村平均每一个劳动力负担人口从 2.53 人下降到 1.57 人；全国每百户人拥有的电视机从 1978 年的 0.3 台增加到 1994 年的近 80 台，每百万人每天拥有报纸从 1978 年的 3.7 份增加到 1993 年的 4.5 份；平均每万人口有商业服务网点数从 1978 年的 13 个增加到 1993 年的 116.5 个。到 1993 年，全国已有 31.5% 的乡镇建立了农村社会保障基金会，各类社会福利院床位达到 95.4 万张，制定的各类环境保护标准已达 313 项，各级环境保护站已达 2 290 个，在全国 472 个城市建成了 293 个烟尘控制区，在 363 个城市中建成了 1 774 个环境噪音达标区。仅 1993 年就投入 25.4 亿元用于环境污染限期治理。

改革是一个利益格局的调整过程，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人的获益要以大部分人的丧失利益为代价，那就会造成剧烈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的不稳定。中国在 15 年的改革中之所以能够保持基本的社会稳定，就是始终坚持了使绝大多数人从改革和经济增长中获得“实惠”的原则，这也就是我们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原则。

### 三、中国社会全面持续发展的条件

#### （一）发展的机遇

前苏联的解体以及东欧国家的变化使世界两大阵营对峙

的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冷战的结束使各种国际力量进行了重新组合，政治对抗压力的减弱暂时降低了军备竞赛的狂热，经济摩擦和冲突有增无减，西欧、东亚的发展和国际经济的区域化使世界进入多极状态。虽然世界南北差距和矛盾仍在扩大和加剧，区域性的战火不断，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中国正处于建国以来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关系最好的时期，对外开放使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和贸易大踏步进入世界经济舞台。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和亚太地区转移，亚太地区成为世界新的经济增长中心，从 60 年代初期到 90 年代初期的三个 10 年中，该地区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 7% 左右 远远超过其他地区 2—5% 的增长率。进入 90 年代以后，这种发展势头仍在继续， 1993 年中国、“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的经济平均增长率为 8%。处在亚太增长中心区域的中国正面临着一次新的发展机遇。

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为中国大量的劳动——资本密集型经济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和市场，中国乐观的经济增长前景和潜在的庞大的市场吸引了国外资金和技术的进入，高增长率和相对较低的劳务价格使中国的发展资本进入较快的积累阶段，中国将用 1981—1995 年的 15 年时间完成其他国家过去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完成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

## （二）结构变动弹性

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已处于刚性状态，第二产业就业早已进入饱和，第三产业吸收就业的能力也已渐入峰区，所以，高失业率成为普遍的发展障碍。而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产值结构中农业产值仍占 20%左右，就业结构中农业劳动力仍占 55%左右，城乡结构中乡村人口仍占 70%左右，结构变动的弹性很大，不仅第二产业仍有进一步吸纳劳动力的能力，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潜力更大，中国的各类城市，特别是小城镇也处于迅速的扩张时期。

在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以后，大众消费结构正在发生出乎预料的快速变化，农村正在从以食品为主的消费转向以家电等生活耐用品为主的消费，城镇则从以家电轻工产品为取向的消费转向与住宅、交通等基础产业相联系的消费，这将使国内市场的容纳能力和需求结构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

对于中国来说，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结构变动将会是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推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将会比科技投入的产出更大。

## （三）体制改革和创新

15 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给经济注入的活力和带来的发展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现在，改革已从突破旧的体制框架和双轨制过渡进入一个全面体制创新的新阶段，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和体制框架已经提出，国有企业的清产核资、转换

运行机制都在加速进行。这一改革必将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所有制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各种经济成分迅速成长和壮大，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1978—1993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所占的比重从原来的78.0%下降到54.6% 集体工业所占的比重从22.0%上升到35.5% 各种非公有制工业的比重从可以忽略不计达到9.8%。根据近10年各类经济成分的平均增长情况预测，1995—2000年，集体工业将平均年增长15%左右，个体工业20%左右；“三资”及其他工业30%左右。按此速度到2000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占30%左右，集体工业占40%左右，个体工业占10%左右；“三资”及其他工业占20%左右。在今后的经济增长中，各种经济成分将会发挥更大的推动作用。对外开放使东南沿海形成的新的经济增长中心也将会对全国经济产生巨大的辐射和牵动力量。

此外，如果在社会保障、劳动就业、收入分配、行政管理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和创新能够取得明显成效，工作和劳动效率也会大为改观。

#### （四）社会秩序的稳定

根据世界各国发展的一般经验 人均 GNP 从 100 美元到 1 000 美元是一个经济社会结构快速变动的时期，其间由于发展的各种不平衡现象，必然导致出现一些剧烈的摩擦和冲突，只有大多数人过上相对宽裕的生活以后，社会结构才会进入

相对稳定时期。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和 1980 年的价格和汇率,中国 1996 年可达到人均 800 美元的目标,2000 年可达到人均 1 000 美元。到本世纪末,现有的 8 000 万贫困人口可基本脱贫,全国绝大多数人口过上“小康”生活,从而形成一个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小康大众”,这将是社会利益格局进入相对稳定时期的基础。

当然,中国社会的稳定还将依赖于以下因素:

1. 长期保持有权威的政治领导;
2. 把物价上涨率和失业率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3. 坚决整治贪污腐败和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
4. 防止贫富悬殊和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
5. 逐步减少和消除贫困人口;
6. 解决好民族和宗教问题。

## 四、中国社会全面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 (一) 人均资源相对不足

从总量上看,我国是一个资源大国,按自然资源总量的综合排序,我国居世界第 4 位。其中矿产资源探明储量潜在价值居世界第 3 位;水能、太阳能和煤炭资源分别居世界第 1、2、3 位;石油资源居世界第 8 位;耕地、草原面积居世界第 4 位;森林面积居世界第 6 位。但从人均资源占有量上来看,我国又是一个资源缺乏的国家。人均耕地面积只为世界